

# 李达同志生平事略

《李达文集》编辑组

李达同志号鹤鸣，一九〇〇年十月二日出生在湖南省零陵县一个佃农家庭里。一九〇九年他考入零陵永州中学。一九〇九年考入京师优级师范。他在赴京途中，目睹汉口、上海、天津等地到处是外国的兵舰、商船、租界、军警、银行、教堂，悲愤满腔，立志要学好科学知识，复兴祖国。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发，他一度感到兴奋。但不久北洋军阀取代了清廷的统治，他极为失望，于是决心走“实业救国”的道路，发奋攻读自然科学。一九一三年，他考上了留日公费生，到东京第一高等师范学习理科。一九一五年日本帝国主义向袁世凯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中国留日学生奋起斗争遭到失败，亡国的惨祸迫在眉睫，他痛感“实业救国”的幻梦破灭了，但却找不到出路。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春雷乍响，使他在极端苦闷中看到了光明，产生了对十月革命的热烈向往。

一九一八年四月，留日中国学生得知段祺瑞政府同日本秘密签订了卖国反苏的“中日共同防敌协定”的消息，义愤填膺，集会抗议，罢课回国，开展救亡运动。李达是这次回国请愿救国团的带头人。五月回到北京，他立即到北京大学与学生领袖许德珩等磋商。经过奔走酝酿，在五月二十一日共同发动了向段祺瑞政府请愿示威的运动。这次学生运动遍及上海、天津、南京等地，为次年的五四运动作了预演。斗争的失败使李达受到深刻的教育，正如他后来回忆的，“使我们深切地觉悟到，要想救国，单靠游行请愿是没有用的；在反动统治下，‘实业救国’的道路也只是一种行不通的幻想。只有由人民起来推翻反动政府，象俄国那样走革命的道路。而要走这条道路，就要加紧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学习俄国人的革命经验。”<sup>①</sup>于是他毅然再赴日本，放弃理科的学习，全力钻研马克思列宁主义。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勤奋地研读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第一卷、《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国家与革命》等马列著作和其他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开始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他翻译了《唯物史观解说》、《社会问题总览》、《马克思经济学说》等书，在国内出版，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一九二〇年三月李大钊同志发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曾把他译的《马克思经济学说》列为阅读文献之一）。当“五四”运动发展到“六三”运动之际，他及时地撰写了《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两篇文章，于六月十八、十九日连续在国内报刊上发表。当他得悉陈独秀被捕的消息后，立即写了《陈独秀与新思想》一文，支援营救陈独秀的运动。同时还发表了《战前欧洲社会党运动的情况》等九篇文章，向国内介绍这些国家社会主义政党的情况。

一九二〇年夏，李达怀着寻找同志干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回国。当年春，第三国际代表先后与李大钊、陈独秀晤谈，提议组织共产党。李达到上海与陈独秀交换了意见，接着与陈

<sup>①</sup> 李达：《沿着十月革命的道路前进》，载《中国青年》一九六一年第十三、十四期合刊。

独秀、李汉俊、陈望道、施存统等共同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后来被称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推陈独秀为书记。在上海发起组的推动下,北京、湖南、湖北、广东、山东等地相继筹备成立了共产党的早期组织。

党的上海发起组创办了我党第一个党刊——《共产党》月刊,由李达主编。《共产党》月刊在黑暗的旧中国举起了共产党的鲜艳旗帜,喊出了“共产党万岁”的响亮口号,号召“举行社会革命,建立劳工专政的国家”。它大力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特别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以及建党理论,批判机会主义,介绍十月革命的成就和经验,报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消息,探讨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问题。它被各地共产主义者的小组列为必读材料之一,并在革命分子中广泛流传,最高发行量达到五千份,实际上成了一个半公开的刊物。毛泽东同志高度赞扬这个刊物“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一日给蔡和森同志的信)。这个刊物虽然在党的“二大”后停刊了,但它在党成立前后的关键时刻所起的宣传、鼓舞和组织作用是永垂史册的。李达同志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为办好这个刊物作了极大的努力,最困难的时候他甚至一个人担负从写稿、审稿到校对、发行的全部工作。

《新青年》杂志自第八卷起改为党的公开机关刊物后,李达参加了该刊的编辑工作。

陈独秀到广东任教育委员长期间,李达继李汉俊之后,从一九二一年二月起代理书记职务,主持党的上海发起组的工作,积极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他代表发起组通知北京、济南、长沙、广州、武汉、东京的小组各派两名代表来上海开会(巴黎小组当时与国内联系较少,未通知),他和李汉俊是上海代表。一九二一年七月“一大”开幕。当大会会场受到法国巡捕房搜查时,他和他的夫人设法在嘉兴南湖租了一条画舫,把代表们转移到那里扮作游客继续开会,直到大会胜利闭幕。在“一大”上,李达当选为党中央宣传主任。

一九二一年九月,党创办了自己的第一个出版社——人民出版社,由李达主持。他亲自担任撰稿、译稿、组稿、校对和发行工作。在一年内,出版了包括《共产党宣言》、《工钱劳动与资本》、《国家与革命》等马列著作以及《〈资本论〉入门》、《第三国际决议案及宣言》、《李卜克内西纪念》等书籍十五种。

一九二一年十月,党为了开展妇女运动,培养妇女人材,创办了上海平民女校。这所学校是党开展妇运工作的据点,又是掩护党的秘密工作的场所。李达兼任校长,亲自为学员讲授马列主义理论。他还指导《妇女声》刊物的工作,为这个刊物撰写关于妇女运动的主要文章,该刊许多重要稿件都经他审阅修改。

建党前后,李达以极大的努力从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研究与宣传,同各种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建党前夕,以梁启超、张东荪为首的研究系发动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进攻,他们鼓吹所谓中国“无劳动阶级”的谬论,主张在中国奖励“开发实业”,“造就”劳动阶级,再实行“社会主义”。当时的共产主义者以《新青年》和《共产党》月刊为主要阵地,对研究系展开了猛烈的反击。李达是这场反击战的主将。他发表的《社会革命的商榷》、《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等文,在击败研究系的反动思潮的斗争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李达还积极参与了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早于马克思主义,在起初各派社会主义思潮中占着优势。建党前夕,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易家钺等人发动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进攻,在倾向革命的青年中,甚至在信仰社会主义的青年中造成了很大的混乱,成

为建立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严重思想障碍。李达在一九一九年六月发表的《什么叫社会主义?》一文中就对无政府主义作了初步的批判。随后发表的《社会革命的商榷》、《无政府主义之解剖》等文章,以及他主编的《共产党》月刊,对无政府主义进行了系统的批判。他揭露了无政府主义的政治观点的荒谬,清算了无政府主义的理论渊源和哲学基础,明确地指出:“能够成为无政府主义的,只有个人主义”。他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还十分注意把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和信仰无政府主义的人区别开来,对“理论”彻底批判,对人则尽量争取。他申明无政府主义者“是我们的朋友,不是我们的同志”,批判无政府主义的目的是“约同这些朋友加入我们的队伍”。他的这些文章对于廓清无政府主义制造的思想混乱,促进信奉无政府主义的革命者的觉醒,扫除建党的思想障碍,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为了在中国建立列宁主义的党,必须划清列宁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界限。建党前夕,他发表了《第三国际党(即国际共产党)大会的缘起》、《马克思还原》、《马克思派社会主义》等文章,援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史实,详细批判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比较准确地阐明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包括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的根本对立,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民主的统一,武装夺取政权,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镇压反革命的职能和组织经济的职能,无产阶级专政的组织形式,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使命等等。在当时我国多数共产主义信仰者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还不可能系统掌握的条件下,李达同志的这些论文对于奠定党的思想理论基础的作用是很突出的。

党的“一大”闭幕不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些极左派在柏林成立的“第四国际”,在一系列原则问题上反对列宁主义。他们的影响虽然不如第二国际,但我们刚刚成立的党如果不同这股极左思潮划清界限,就有离开列宁主义轨道的危险。李达在第四国际出现仅仅半年以后就写了《评第四国际》一文,就共产党的领导问题、对待黄色工会问题、对待资产阶级议会问题、联合农民问题等方面系统地批判了他们的错误理论和策略。他特别强调党的领导的重要性,指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柱石,是无产阶级的头脑”,“共产党不仅在革命以前是重要,即在革命时也是重要,革命之后又须监护劳农会尤其重要。除非到了共产主义完全实现的时代,共产党不可一日不存在。”这篇论文进一步发挥和补充了他在“一大”以前的思想,表明他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以及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认识水平又有了提高。

建党前后,李达很重视直接向工人阶级灌输科学社会主义的工作。为此,他写了《劳动者与社会主义》、《劳工神圣颂》、《五一运动》、《对于全国劳动大会的希望》、《劳动立法运动》等文章。他还非常关心妇女解放运动。除了主持平民女校以外,还以很大的努力研究妇女问题,亲自撰写和译介了大量文章。他撰写的文章有《女子解放论》、《告诋毁男女社交的新乡愿》、《介绍几个女社会革命家》、《平民女学是创造新社会的第一步》、《说明本校(按:指平民女校)工作部之内容》、《女权运动史》等;翻译的著作有《社会主义的妇女观》、《列宁的妇人解放论》、《劳农俄国的妇女解放》、《女性中心说》、《绅士阀与妇女解放》、《产儿制限论》等。

此外,李达为了驳斥敌人对新生苏维埃俄国的诽谤,宣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撰写了《俄国的新经济政策》一文,译述了长达三百七十七页的《劳农俄国研究》的专著,全面地介绍了苏维埃俄国的情况。

李达同志建党前后的著作,带有我国早期共产主义者不可避免的不成熟的痕迹,没有解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的问题,对中国的历史特点和社会性质以及由此决定的中国革命的具体道路都还缺乏明晰的认识。但是,他对各种反马克

思主义思潮的批判，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阐发，对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坚持共产党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论证，在当时的共产主义者当中是比较突出的。他的实际活动和理论活动，表明了他作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启蒙思想家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传播和党的创建作出了一份不可抹煞的贡献。

一九二二年七月，李达出席了党的“二大”，当选为中央委员。同年，他应毛泽东同志的函邀到湖南任自修大学学长，并主编自修大学机关刊物《新时代》。除了湖南最早的一批共产党员是自修大学的学员外，自修大学还培训了一些来自工人和青年的先进分子。李达同志为他们辅导和讲授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科学社会主义等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编写《马克思主义名词解释》等教学资料。在这期间，李达同志和毛泽东同志朝夕相处，共同研讨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问题，结下了战斗的友谊。

当时，党面临的任務就是实现党的“二大”宣言提出的党的最低纲领，即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了实现这个最低纲领，党内开始酝酿国共合作。毛泽东同志在《新时代》创刊号上发表的《外力、军阀与革命》，李达同志在这个刊物上陆续发表的《何谓帝国主义》、《为收回旅大敬告国人》、《马克思学说与中国》、《中国商工阶级应有之觉悟》、《旧国会不死，大盗不止》等论文，都是围绕着“帝国主义如何打倒，武人政治如何推翻”这个根本问题，阐明党的“二大”宣言的基本精神的。李达同志在《马克思学说与中国》一文中，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分析了中国政治经济形势，论证了党的“二大”宣言的正确方面，批驳了胡适等人散布的所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几乎全无事实上的根据”的谬论，证明“中国共产党联合国民党推翻军阀政治的主张，在马克思学说上也是有基础的。”另一方面，他针对陈独秀在国共合作问题上的右倾观点指出：“中国国民党似乎是一个社会民主的党派，有资本家、知识分子和劳动者三种党员，共产党至好是影响他们向左倾。将来民主革命成熟时，共产党至好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去。不然，共产党应该单独的严整无产阶级的阵。”并认为在民主联合阵线中，“共产党应注重‘组织无产者成为一阶级’的工作，时时要保持独立的存在，免受他党的影响。”他在这篇文章的开头就提出：“马克思学说之在中国，已是由介绍的时期而进到实行的时期了”，“对于这样重大的事实（按：指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似有慎重研究和考校的必要，所以在这里提出‘马克思学说与中国’的论题来讨论一番。”他的这篇文章以及这时期的其他文章虽然没有真正解决把马克思学说运用于中国具体革命实际的问题，但却是朝着这个方向迈出了可贵的步伐。

在湖南期间，李以极大的精力从事唯物史观的研究。他在自修大学讲授唯物史观。当自修大学被军阀赵恒惕封闭后，又在湖南公立法政学校、湖南大学、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继续讲授唯物史观，并写成了《现代社会学》一书，于一九二六年六月正式出版。在书中，他系统地阐述了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论述了世界革命和中国革命的问题，并批判了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他明确地指出中国是一个“半封建”社会，是“帝国会主国家之半殖民地”，“夫民族革命之对象虽在颠覆帝国主义，而弱小民族内为虎作伥之封建阶级或帝国主义之代表，亦在推翻之列。”并尖锐地提出革命领导权的问题：“领导民族革命运动者，果为资产阶级乎，抑为无产阶级乎？”他的回答是：“能成为民族革命之中坚者”，是“弱小民族之无产阶级”，是“共产党”。他还推断了民族革命成功后的前途，指出：“民族革命成功时，小资产阶级得势，则必采用私人资本主义；无产阶级得势，则必采用国家资本主义”，“国家资本

主义乃社会主义之过渡”。他还强调了中国革命必须与国际无产阶级联合，指出“不与国际无产阶级相联合”的“机会主义之民族革命，较不革命尤为有害”。李达多年以后自认为这本书只是“摸索写成的不成熟的著作”，但在当时，这本书确是很切合革命需要的。它在革命者中间广泛流传，而被反动派视为洪水猛兽。国民党反动派通缉李达的“通缉人犯”表上开列李达的“罪恶事实”是：“著名共首，曾充大学教授，著有《现代社会学》，宣传赤化甚力”。

这一时期，李达继续坚持翻译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在《新时代》上发表了他译的《德国劳动党纲领栏外批评》（即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为了帮助群众加深对帝国主义侵略本质的认识，他翻译了《中国关税制度论》一书。另外，他还继续坚持对假社会主义的批判。一九二三年八月，冒牌社会主义者江亢虎在长沙作了几次蛊惑人心的讲演，李达当即撰写了《社会主义与江亢虎》等文章在湖南《大公报》上发表，驳斥江亢虎的澜言。

一九二三年夏，李达由湖南到上海与陈独秀商谈国共合作问题。由于他主张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反对以整个团体加入国民党，为此与陈独秀发生了激烈的争执。李达同志未能采取正确的斗争方式以坚持自己的正确意见，回到长沙后愤而中断了同陈独秀主持的中央工作部的联系，随后离开了党的组织。

李达同志从离开党组织到一九四九年重新入党的二十多年里，仍然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与宣传，坚持为党工作。

他和陈独秀主持的中央断绝关系之后，回到湖南，仍然和湖南的党组织战斗在一起，除继续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和宣传外，还协助党组织做一些外围工作，常常向长沙党的负责同志介绍进步学生入党。一九二六年十月，北伐军攻占武汉后，李达由长沙赴武汉就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编审委员会主席兼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教官和代理政治总教官，并主持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教务工作和招生工作，与毛泽东、周恩来、恽代英等同志分工讲授革命理论。一九二七年初，与邓演达、恽代英担任农民问题讨论委员会常委。在此期间，毛泽东同志还委托李达同志去做唐生智将军的工作。唐生智后来回忆说：“记得一九二七年春，在武汉，有一次李达到我家来，他说：‘润之先生希望你同我们一起干革命，要我来问你，你干不干？’我说：‘干当然要干嘛！’”随后，李达同志回长沙与谢觉哉、郭亮等同志筹办国共合作的国民党省党校，实际上是我党为土地革命培训干部的党校，由唐生智遥领校长名义，谢觉哉任秘书长，李达任教育长。李达动员了不少要求革命的青年投考党校。党校举行开学典礼之日，发生了“马日事变”，李达接到党组织通知，转移至家乡零陵。湖南反动当局通缉李达，他在家乡无法藏身，乃转移武昌，又险遭桂系军阀的杀害，一九二七年冬潜往上海。

李达到上海后，在严酷的白色恐怖环境中继续坚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阵地，于一九二八年与邓初民等创办昆仑书店，大量出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书籍，并亲自翻译和撰写了许多理论著作。

李达在一九二九年发表的《中国产业革命概观》、《社会之基础知识》、《民族问题》三本专著，明确地回答了中国革命向何处去的问题。《中国产业革命概观》一书援引了国内外关于中国经济的大量统计资料，对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的经济状况及其趋势作了分析，得出明确的政治结论：“要发展中国产业，必须打倒帝国主义的侵略，廓清封建势力和封建制度，树立民众的政权，发展国家资本，解决土地问题。”关于中国革命力量的特点，本书指出：中国产业工人在封建势力和中外资产阶级的压迫下“无时不感到生命的危险和失业的威胁，其地位和境遇实在是非常残酷的”，“他们确是中国革命的急先锋”；农民的绝大部分则“失地的失地，

失业的失业，生活的困难已是达于极点。就近年来全国农民运动的形势说，有组织的农民曾发展到数千万之多，尤其是粤湘鄂赣等省的农民，已经表现着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大力量，表现着为革命而奋斗的大功绩。”《社会之基础知识》一书在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基本原理之后，专门分析了中国的出路，全书的结尾在“中国的出路”的标题下写道：“中国一面是半殖民地的民族，同时又是半封建的社会。所以为求中国的生存而实行的中国革命，一面要打倒帝国主义，一面要铲除封建遗物，前者是民族革命的性质，后者是民主革命的性质，其必然的归趋，必到达于社会革命，而与世界社会进化的潮流相汇合。”《民族问题》一书在论述研究民族问题的目的时指出：“民族问题，是世界革命的根本问题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之一。要了解世界革命和中国革命的理论 and 策略，就必得研究民族问题”。该书根据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概述了民族问题的基本原理，着重分析了被压迫民族革命问题，指出：“民族解放运动，是世界革命最重要的枢纽，是与资本主义斗争全部的问题，是与打倒帝国主义及被压迫阶级革命相关联的问题，决不是孤立的单独的问题。”表达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革命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思想。

从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〇年，李达还翻译出版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穗积重远的《法理学大纲》、塔尔海玛的《现代世界观》、杉山荣的《社会科学概论》（与钱铁如合译）、河上肇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与王静、张粟原合译，李达译的一部分是《马克思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卢波尔的《理论与实践的社会科学根本问题》、河西太一郎的《农业问题之理论》等著作。这些译著的译者前言或后记都说明了李达翻译的目的是为了给广大群众以认识中国革命的武器。

一九三〇年，李达经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书记、中共地下党员张庆孚同志介绍，到上海法政学院任教；一九三一年又经张庆孚同志介绍到暨南大学任教，并兼任社会系主任。李达在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把大学作为宣传革命真理的讲坛，勇敢地对广大青年学生讲授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分析中国革命的问题。他的讲课受到进步青年的热烈欢迎，教室里常常挤得满满的，外系学生也来听讲。不少青年因为受到他讲课的影响而决心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反动派对他极为嫉恨，经常进行刁难捣乱，甚至找寻借口搜查他的住宅。“九一八”事变后不久，他在一次讲演后遭到特务暴徒的毒打，右臂骨和右锁骨都被打断，住院治疗达七个星期之久。他对敌人的残酷迫害极端蔑视，毫无畏葸。他一面以顽强的毅力锻炼右臂，恢复写作能力，一面继续利用讲课和学生的个别访问，宣传革命理论。一九三二年二月，反动当局借口“迁校”，终于将他解聘，使他在上海无法立足。

一九三二年五月，党组织通知李达到泰山为冯玉祥将军讲学，李达欣然接受党交给他的任务，到泰山为冯玉祥及其身边工作人员讲授列宁主义和唯物史观，进行革命宣传。

同年八月，李达到达北平。从这时起，到一九三七年六月，他在北平大学法商学院任教，兼任经济系主任，并在中国大学、朝阳大学兼课。国民党北平市党部和宪兵第三团监视他的行动，地下党和进步师生则多方保护他。在险恶的环境中，他无所畏惧，勤奋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学校讲授经济学、社会学（即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发展史、货币学等课程，同时进行了大量的著译工作。

在经济学方面，他撰写了《经济学大纲》、《货币学概论》两本专著，及《中国现代经济史之序幕》、《中国现代经济史概观》等文章，与熊得山合译了拉比托斯等著的《政治经济学教程》。

《经济学大纲》是他这段时间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成果，一九三五年由北平法学院出版。毛泽东同志向延安理论界推荐此书时说，李达“寄我一本《经济学大纲》，我现在已读了三遍半，也准备读它十遍。”（引自郭化若：《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片断——纪念毛主席八十五诞辰》一文）李达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目的，正如他在这本书的结论中说的，“我们不是为了研究经济学才研究经济学，而是为要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才研究经济学”。他批评过去的中国经济学家们“专门研究外国经济，却把中国经济忽略了”，“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是极大的缺点”。他认为研究经济学“除了研究历史上各种顺序发展的经济形态以外，还必须研究中国经济”。他十分注意“经济进化的一般原理在中国经济状况中所呈现的特殊的姿态、特殊的特征”。他在《经济学大纲》以及研究中国现代经济史等文章中就是以这个思想为指导，“以期建立普遍与特殊之统一”的经济理论，掌握“中国经济的特殊的发展法则”，了解“中国经济的来踪和去迹”。他在《经济学大纲》中具体考察中国经济的现状时，指出了“三个互相交错的过程：帝国主义侵略的过程、民族资本萎缩的过程和封建农业崩溃的过程。这三个过程中，第一过程占居统制的地位，这是不待多言的，第二过程已是第一过程的附属物，第三过程虽然被第一第二过程所统制着，却仍然表现顽强抵抗的力量，仍在困苦状态中挣扎着。……现在的中国经济，是处于帝国主义宰割之下的、工农业陷于破产状态的经济。这种经济，可以说是国际资本主义殖民地化的经济。在这种特殊的经济状态下挣扎着的中国国民，究竟应该怎样寻求自己的生路呢？这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整个中国自求生存、自求解放的问题。”这就是从中国经济现状分析中得出的政治结论。

在这段时间内，在哲学方面，李达撰写了《社会学大纲》、《社会进化史》两本专著及《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等论文，还与雷仲坚合译了西洛可夫等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社会学大纲》的内容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全书四十余万字，是李达用三、四年时间写成的，定稿于一九三六年，一九三七年五月由上海笔耕堂书店首次出版。李达在此书的四版序言中指出：“中国社会已经踏进了伟大的飞跃的时代，我无数同胞正在壮烈的牺牲着，英勇的斗争着，用自己的血和肉，推动着这个大飞跃的实现，创造着这个大时代的历史。这真是有史以来空前的大奇迹！可是，战士们为要有效的进行斗争的工作，完成民族解放的大业，就必须用科学的宇宙观和历史观把精神武装起来，用科学的方法去认识新生的社会现象，去解决实践中所遭遇的新问题，借以指导我们的实践。这一部《社会学大纲》是确能帮助我们建立科学的宇宙观和历史观，并锻炼知识的和行动的方法的。因此，我特把这书推荐给战士们之前。”《社会学大纲》在革命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都有广泛的影响。一九三七年五月首次出版后，李达同志立即将此书寄请毛泽东同志指正。毛泽东同志十分高兴地阅读了十遍，作了详细眉批，向延安哲学研究会和抗日军政大学推荐了这本书，指出这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部马列主义的哲学教科书，在十年反动时期有这样一本书是难得的，并写信给李达同志，热情地称赞他是“真正的人”。刘少奇同志也曾向干部推荐学习这本书。一九四八年，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新华书店重新出版过此书。一九六一年八月，毛泽东同志还建议将此书修改出版，认为对当代的读者仍有现实意义。

在北平的这段时间里，李达除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上作出了新的贡献外，还以很大的热情参加党领导的政治活动。一九三三年一月，他受党的委托到张家口再次对冯玉祥将军进行革命宣传，说服冯玉祥联共抗日，并帮助冯玉祥与党组织取得联系，促成冯玉祥树起了察哈尔抗日联军的旗帜。尽管不久抗日联军遭到失败，但它对于尔后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

的形成有着重大的影响。一九三四年六月，在党的领导下，宋庆龄、何香凝等发起建立“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发表了《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发动了一七七九位有影响的人士签名，李达是十名领衔签名者之一。

“七七”事变后，李达应聘到桂林广西大学任教，未到任已被解聘。一九三八年春，原北平大学法商学院院长白鹏飞就任广西大学校长，李达才重被聘到该校任经济系教授兼系主任。李达给学生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经济学，并作过多次讲演。

一九三九年一月，李达应冯玉祥将军之邀，为冯玉祥及其研究室人员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代邀黄松龄、邓初民讲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政治学。他同在冯玉祥研究室工作的共产党员赖亚力等同志一道推动冯玉祥同共产党合作。一九三九年九月，李达回到桂林，准备仍在广西大学任教，不料白鹏飞已被撤职，他所聘的教授均被解聘，李达因而失业。此时，周恩来同志派曹瑛同志给李达同志以政治上的鼓励和经济上的接济。李达还曾应邀给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的干部讲授哲学。一九四〇年秋，李达应聘到广东坪石中山大学任教，一九四一年七月又被国民党教育部电令解聘，不得不回家困居。李达在家乡继续从事著述。一九四四年七月零陵沦陷，日军搜捕李达，他逃往徕山避难，遇到土匪的抢劫，他在这几年中辛勤写作的手稿，连同他珍藏多年的毛泽东同志给他的亲笔信都被抢走，直到日本投降后他才重返家乡。

一九四七年春，李达同志经地下党协助和友人李祖荫介绍到湖南大学任法律系教授。国民党特务机关对他严密监视，通过学校当局规定不准他讲演、会客和过问政治，并把他列入黑名单的第一名，作为随时可以逮捕的对象。李达不顾个人安危，仍然坚持以马克思主义观点讲授社会学和经济学，在自己家里接见青年学生，鼓励他们参加革命斗争。他以极大的毅力克服严重的胃溃疡的折磨，在一年的时间里完成了《法理学大纲》一书的写作。在这本专著里，他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剖析法律现象，巧妙地抨击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专政。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至一九四九年四月期间，李达协助湖南地下党组织动员程潜将军起义。当时，中共湖南省工委根据党中央关于可以和国民党地方局谈判和平的指示精神，结合湖南具体情况，决定积极开展策动程潜将军起义的工作。湖南地下党组织负责此项工作的余志宏同志委托李达同志做程潜周围人士的工作，并通过他们说服程潜走和平起义的道路。程潜对李达提出的许多建议十分重视，他希望李达向毛主席汇报他的情况，并要求与中共湖南地下党组织的正式代表见面。一九四九年五月李达应邀到达北京时，曾向毛泽东同志汇报了湖南的情况和程潜的动向，为中央决定和平解放湖南的方针提供了重要情报。中共湖南地下党组织的代表余志宏同志也与程潜见面，并与程的代表磋商起义的具体事宜。李达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冒着极大的危险，接受党的重托，为湖南和平解放贡献了力量。

一九四八年，毛泽东同志通过党的地下组织带信给李达同志，邀他赴京工作。在中共华南分局的安排下，李达由李梅彬、陈力新护送，于一九四九年四月十六日离开长沙，秘密赴香港，五月十四日到达北京，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的热烈欢迎，并与阔别多年的毛泽东同志彻夜长谈。党中央根据李达同志几十年来的表现，由毛泽东、刘少奇、李维汉、张庆孚等同志作他的历史证明人，刘少奇同志作他的介绍人，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批准他重新入党，不要候补期。

新中国成立后，李达继续从事理论工作和高等教育工作，先后担任中央政法干校副校长、湖南大学校长、武汉大学校长，当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第三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被推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哲学学会会长。他在理论战线上以“老兵”自命，不顾年老多病，竭尽全力研究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发表了大量的文章、专著和讲演。他的著作受到党内外广大群众的重视和毛泽东同志的好评。他在教育战线上认真贯彻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路线，重视人材，尊重知识分子，关心群众，同“左”倾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受到广大师生员工的爱戴。他在原则问题上旗帜鲜明，决不随波逐流。当林彪鼓吹“顶峰”论甚嚣尘上的时候，他以高度的原则性公开坚决反对这种反马克思主义的谬论。为此，他遭到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残酷迫害，被诬陷为“反毛泽东思想的最凶恶的敌人”，于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含冤去世，终年七十六岁。

李达同志是最早在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之一，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他在将近半个世纪的长时期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不仅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都有深入的研究，而且在法学、货币学、史学理论等领域也做了重要的开拓性的工作。他的理论活动是同中国革命的脉搏息息相关的。他的卷帙浩繁的著作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半个世纪来我国思想界经历的道路，是一份珍贵的遗产。他是我国现代史上一位有影响的人物。研究他的著作，对于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在我国传播的历史、我国近现代思想发展的历史以及我们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历史，都是有必要的。由于历史条件和他个人特点的局限，他的著作中也有不成熟、不精当和错误的东西。然而，他的成就和缺点，贡献和失误，都是他在革命道路上曲折前进的真实足迹的反映，也正是他的著作的价值。